

# 香港傳真

(香港) 桑尼研究有限公司  
中國稅務雜誌社綜合研究組

No. 2009-61

2009年11月13日

\*\*\*\*\*

## 關於“西路軍”問題的幾點初步認識 —— 讀《中國工農紅軍西路軍（文獻卷）》有感

周宏林

“西路軍”問題，是黨史和軍史研究領域，一個重要且又爭議比較大的歷史問題。如何看待這個問題？以及這個問題給我們帶來怎樣的回憶和思考？一直是我們在努力探索的一個重要課題。長期以來，各方面對這個問題一直存在不同看法，有些意見分歧還是相當尖銳的。如果排除政治上的因素去進行分析，史料的缺乏和不透明，是造成這種狀況的一個重要原因，給學術研究工作帶來了鉅大的困惑和障礙。這也從一個側面，反映出在黨史和軍史研究領域，所存在的某些偏差性。這種偏差性，如果不能及時得到糾正，將會對黨史、軍史研究的科學性和社會公信力，造成長遠的、不利的影響。因此應該引起我們足夠的重視，並尋

求正確的工作方法，逐步加以解決。

《中國工農紅軍西路軍（文獻卷）》（下稱《文獻卷》）的出版，<sup>1</sup>就是在這方面，所進行的一種積極的嘗試。這部作品不僅為我們提供了一部研究“西路軍”問題，比較詳盡、比較客觀的歷史史料，使我們有可能依據這些史料，對這一歷史問題，進行準確的回顧和分析；同時更為重要的是，它還向我們展示了一種科學、求實的研究方法。即：在研究黨史、軍史重大問題時，一定要重視對史料的搜集和整理；始終遵循歷史唯物主義和辯證唯物主義的方法，在認真研究史料的基礎上，準確地還原歷史原貌，客觀地、實事求是地分析和研究重大歷史問題，及其所產生的原因和後果；正確地抽象和總結歷史現象，科學地引導運用歷史經驗；使我們的研究成果，不僅要為現實工作服務，還要對歷史和後人負責，經得起時間的檢驗。這是一種對待史學研究工作，科學、嚴謹的態度。

長期以來，在黨史和軍史研究領域，也確實存在著某些錯誤的傾向。比如：忽視史料的基礎作用；對史實隨意進行修改；把科學、嚴肅的黨史和軍史研究，演繹成為一種充滿唯心主義和英雄史觀的“戲說”之作，等等。這種做法的實質，是用唯心主義代替唯物主義，以片面性、極端性代替辯證法。這種教訓，過去曾在我們黨的歷史上，屢次發生過，應該講有其深厚的歷史根源和文化背景。在“改革、開放”30年後的今天，我們黨、我們軍隊將面對更加民主、更加開放的發展形勢。在這一歷史背景下，出版這一類的歷史文獻資料，公開、公平地向社會提供歷史信息資源。這一做法，反映出我們在觀念上的轉變和進步；對我們逐

---

<sup>1</sup> 郝成銘、朱永光等主編：《中國工農紅軍西路軍（文獻卷）》，甘肅人民出版社2004年。

步改進研究工作，規範學術行為，完善新時期黨史和軍史研究的科學方法，將產生積極和深遠的影響。

“西路軍”問題，同時還是一個相當複雜的歷史問題。其所以複雜，除了上述原因外，其中還有一個重要的因素，就是作為一次影響重大的軍事失敗，長期以來，這一過程一直被用一種“政治化”的方式，來加以解釋和宣傳，從而切斷了它與歷史演進過程之間的聯繫；這不僅與客觀史實不相符合，也違背了某些辯證唯物主義的基本觀點；因此從結果上看，它不可能清晰地解讀這一歷史事件的真正原委，而只能使這一問題日趨複雜化。要解決這一難題，同樣也需要提供史料方面的支持；並且要適時調整我們的研究方法，用辯證唯物主義的思想理論，來指導我們的研究思路。把我們的研究工作，真正轉化成為一種對歷史現象，全面、客觀、鮮活、有連續性的思考。只有這樣，才能使我們的研究成果，堅實地建立在科學性和真實性的基礎之上，具有更為深刻的認知歷史和解讀歷史的能力。

過去我們對“西路軍”問題的認識，大多是建立在閱讀個人“回憶錄”（或“傳記”）的基礎之上，因此認識水平常常受到作品“主觀性”（或“片面性”）的影響；且大部分作品都是採用“記敘式”的方法，就事論事，很難幫助讀者從宏觀的角度，來認識和把握這一重大歷史事件的來龍去脈。這給深入進行學術研究和探討，帶來了極大的局限性。可以說《文獻卷》的出版，展開了“西路軍”問題研究的一個新階段。作品提供的豐富史料，使我們有可能從一些全新的角度，來審視和研究這一歷史問題，加深我們對“西路軍”問題全貌的認識和理解。這對於澄清不同看法，統一思想認識，促進對黨史、軍史重大問題的研究和探討，都是十分有益的；同時也為廣大史學工作者（或史學愛好者），

提供了一條正確的、科學的研究和探索之路。筆者就是在認真閱讀了這部作品之後，開始對“西路軍”問題產生了興趣，並有了一些新的看法和認識。現簡述幾點感受，懇請各位專家和前輩們指教。

## 一、“西路軍”的河西之戰， 一次具有重要歷史意義的軍事行動

“西路軍”問題，從時空定位上看，是紅軍三大主力在完成戰略轉移（長征）之後，即將進入陝甘寧蘇區之前，所進行的一次最為重要的軍事行動。這次軍事行動是發生在紅軍歷史上，若干重要的“轉變過程”之中；因此它對後續事態的發展，影響是重大的，深遠的，有些甚至是帶有決定性的。我們可以把這些重要的“轉變過程”，集中概括為以下四點：一是紅軍主力即將會師陝北的“轉變過程”；二是紅軍主力（包括相應的軍事指揮權）由分散趨向於集中的“轉變過程”；三是紅軍各部隊所面臨的諸多問題，由表面化向實質化發展的“轉變過程”；四是國內政局變化的“轉變過程”。如果我們把這四點“動態”過程，作為背景來進行觀察，可以清晰看出，“西路軍”的戰事活動，與此前紅軍各部隊，所進行的諸多戰鬥相比（無論這些戰鬥，是發生在蘇區，還是發生在長征途中），具有以下幾個明顯的“不同”點：

1、執行的作戰任務不同。“西路軍”西渡黃河作戰，是執行中央（軍委）下達的戰略性任務，即：展開“寧夏作戰”計劃，打通國際路線，爭取外部援助。這是一個中央謀劃已久，指向性很明確，剛性很強的作戰任務；同時也是當時紅軍諸多作戰行動，

所要配合的主要目標之一。參戰部隊在執行這一任務過程中，可供選擇的餘地和機動空間都很小；其“自身的生存與發展”，完全要服從於完成“戰略性任務”的要求。這意味著對參戰部隊而言，要具備更高的軍事素養，更強的組織紀律原則，以及更大的犧牲和奉獻精神。這與此前紅軍各部隊所執行的諸多戰鬥任務相比，情況是不同的。此前紅軍各部隊在執行戰鬥任務時，由於外部嚴酷環境的壓力，一般首先要考慮解決“自身的生存與發展”問題，而後才談得上配合上一級軍事組織，執行更高層面的戰略性任務。這些戰事活動的特點，與“西路軍”所受領的作戰任務相比，性質完全不同；其作戰目標的隨意性更為寬泛，指向性更為靈活，機動空間也更大，更符合當時紅軍游擊作戰或運動作戰的規律和特點。

此前雖然紅軍各部隊，也有少數戰事活動，與“西路軍”的情況比較相似。例如：1934年7、8月間紅六軍團的先遣西征，以及方志敏所領導的“北上抗日先遣隊”等。這些戰事活動的共同特點，就是戰略意圖比較明顯，指向性比較強；但在其任務的重要性和活動範圍，以及作戰方式和作戰規模等方面，仍然與“西路軍”的情況有所區別。簡單地視同一般，也缺乏必要的根據，需要做進一步的研究和探討。對於這一點，我們應該有清醒的認識和理解。

2、部隊的組成不同。在實行“武裝割據”的年代，由於敵人的包圍和封鎖，以及諸多客觀條件的限制，紅軍各部隊被孤立在各個封閉的作戰區域內，單獨進行作戰；進而逐漸形成了本地化、群體化和獨立性都很強的戰鬥實體，即我們後來通常所講到的“山頭”；而以“山頭”為基礎組建作戰部隊，又成為那個時期紅軍戰事活動的一個基本特點。這種情況，一直延續到紅軍長征

以後，才開始有所改變；但帶有“根本性”的改變，還是發生在“三大主力”會師之後；而“西路軍”的組成，則成為這種“根本性”改變的一個重要標誌。

“西路軍”不是由一個“山頭”的紅軍部隊組建而成的；而是由一、四兩個方面軍的部隊共同組建而成的，其中又以四方面軍的部隊，為主力作戰部隊（其間，二方面軍的部隊和陝甘紅軍，也分別參與了有關作戰的配合行動）。這種打破“山頭”界限，集合紅軍主力，採用聯合作戰方式，組建作戰部隊，本身就說明了其所執行的戰鬥任務，更具有全局性和戰略性的特點。這在此前紅軍的歷史上，並不多見，因此具有開創性的意義。

需要說明的是，在紅軍主力會師之後，也曾有過幾次規模較大的部隊重組活動。如：一、四方面軍會師以後，成立的“左路軍”和“右路軍”；二、四方面軍會師之後，組建的“三路縱隊”；以及與“西路軍”相呼應，組建成立的“南路軍”和“北路軍”，等等。但這些重組活動，與“西路軍”的情況都不相同，不具有直接的可比性。他們或者組建的戰略意圖不夠明顯；或者存在的時間比較短；或者沒有展開什麼戰事活動；或者基本上保持了原有的“山頭”狀態，等等。紅軍主力會師以後，這種頻繁的重組和解體活動，一方面可以理解是，主力會師之後正常的工作需要；另一方面恐怕“山頭”的因素，也是其中一個重要原因。這恰恰從一個側面，更突顯出“西路軍”組成的特殊意義，值得我們去做進一步的研究和探討。

3、指揮作戰的方法不同。“西路軍”作戰，具有指揮權高度集中、統一的特點；特別是對一些涉及到全局性和戰略性的軍事舉措，都是由中央（軍委）直接下達命令，進行調度和指揮的。透過這種高度集中、統一的指揮方法，其深刻的含義是：中央（軍

委)指揮系統,開始對紅軍主力部隊,執行戰略性任務,實行集中、統一領導。這在紅軍發展史上,是一次重大轉變,在黨史和軍史研究中,應佔有重要的基礎性地位。

強化對“西路軍”(相當於“方面軍”一級)的“指揮”關係,從當時情況看,是中央(軍委)指揮系統,所應該採取的一種正確措施,對紅軍的長遠發展是有利的。但這種做法,同時也是一把“雙刃劍”。它有利於加強對部隊的統一調度和指揮,卻又容易削弱方面軍一級領導機關,在決策和指揮方面,所應有的機斷處置權和靈活性。如果處理不好(如:內部缺乏充分勾通和理解;沒有專業、技術條件保障等),這種看似能夠“運籌帷幄,決勝於千里之外”的用兵機制,常常會因為“不瞭解情況,脫離實際”,而導致災難性的後果。這種教訓,在紅軍創建初期是不不少的;“西路軍”的失敗,就是其中突出的一例。分析原因,除主觀因素外,應該講更多的還是受到客觀條件的限制,說明當時紅軍主力部隊,尚不具備大兵團運動作戰的條件,並且也不適應這種高度集中、統一的指揮作戰的方法。

4、作戰的區域不同。如果用“地緣政治”的觀點去考察,紅軍主力由過去主要在長江以南或長江流域的山區、丘陵地帶進行作戰,轉變到西北地區毗鄰蘇(聯)、蒙(古)邊境,貧瘠、荒漠化的少數民族聚集區域進行作戰;這種作戰區域的變化,在當時情況下,對紅軍指戰員最大的心理衝擊,就是儘快打通國際路線,尋求外部的支持和幫助。這是凝聚全軍士氣,促使“西路軍”戰事演變的最基礎原因之一。

“西路軍”西渡黃河作戰,執行的是中央(軍委)下達的戰略性任務;實行的則是無(後方)依託的外線作戰。戰事活動主要是在遠離根據地的白區或新區進行。而同時期其他一些紅軍主

力部隊（如一方面軍，及後來組建的“西方野戰軍”等），在先期到達陝北後，也展開了一系列的戰事活動。但這些戰事活動，主要是圍繞在根據地周邊地區進行，屬於有（後方）依託的外線（或內、外線結合）作戰。我們如果對這兩種情況進行深入分析，可以看出：（1）由於作戰的區域不同，決定了作戰的方式不同，從而導致作戰的結果，也會有所不同；（2）自長征途中，紅軍主力會師以後，有關下一步“戰略發展方向”的爭論，除了通常我們所提到的，“南下”和“北上”這兩種方案外，還應該包括一個“西進”的方案。提出這一點很重要。因為這不僅關係到準確理解中央當時的戰略意圖，也關係到四方面軍，尤其是“西路軍”的發展和命運，是“西路軍”問題研究的一個重要內容。實踐最終證明：在這三種方案選擇中，只有“北上”的方案是正確的；而“南下”和“西進”的方案，都是行不通的。

5、作戰的對象不同。由過去主要同敵步兵作戰，轉變為主要與敵機動性較強的騎兵作戰（並有仇共、仇漢心理很強的部族民團配合），敵我優劣態勢發生變化；加之當時正處在“西安事變”前後，國內政治形勢突變，“反共剿共”與“抗日救國”兩種浪潮同時高漲，“敵、我、友”態勢也隨之發生變化；反映在戰場形勢上，文武之道也應各顯張弛。但“西路軍”長期在外線作戰，遠離中央，信息閉塞，對情況變化知之甚少，無法有效利用（例如：未能適時調整“西進”態勢，擴大統一戰線，“化敵為友”等），只能維繫剛性運作，最終錯失良機，導致失敗。而當時紅軍其他主力部隊，面對突發事件，都及時採取了有效的“應變措施”（例如：調整政策，改變作戰對象等），因此能夠迅速地擺脫被動狀態，走出危局。兩種結果形成鮮明對照。



## 二、“西路軍”的河西之戰， 一次“轉變歷史”的軍事失敗

“西路軍”的河西之戰，是我軍歷史上一次重要的軍事失敗。這次失敗到底給我們黨、我們軍隊帶來了怎樣的思考？這是一個值得我們深入探討的問題；同時也是一個我們必須回答的，客觀、公正評價歷史的問題。恩格斯說：“沒有哪次鉅大的歷史災難，不是以歷史的進步為補償的”。這是一段辯證看待歷史進程的精闢論斷。“西路軍”悲壯的戰鬥歷史，恰恰從一個角度驗證了這一論斷的正確性。它使我們在認真總結“西路軍”失敗教訓的同時，也可以從另外一個視角，用另外一種境界，來審視和看待這段戰鬥歷史，以及它所折射出來的“敗與勝”的辯證關係。

“西路軍”是一次軍事性的失敗。但造成這次失敗的原因，卻不僅僅是軍事性的，而是包含多方面的因素。除前述幾點“不同”外，在政治上、體制上、觀念上，都反映出紅軍主力在會師之初，相互之間所存在的隔閡、猜疑、矛盾及紛爭等；而“西路軍”的軍事失敗，使這些隱含的、深層次的原因，完全暴露在全黨和全軍的面前，從而使這些問題的解決，具備了一些重要的前提條件。這就是我們通常所講的“失敗乃成功之母”的道理。從這個意義上講，可以說“西路軍”的軍事失敗，對中共及紅軍今後的命運和發展，是產生了深遠影響的；甚至可以說，這是一次“轉變歷史”的軍事失敗。這種“轉變”的深刻含義，包含以下幾點具體內容：

1、完成了黨對紅軍的統一領導。黨對紅軍的統一領導，無論是從理論到實踐，還是從形式到內容，都是一個歷史漸進的過程。而在這一過程中，“西路軍”所扮演的重要“角色”，就在於：

它從理論和實踐、形式和內容的統一點上，階段性地完成了對這一重大命題的詮釋和運用。作為當時最具戰鬥實力的作戰部隊之一（其戰鬥實力，約佔當時紅軍總戰力的40%左右），“西路軍”在這一問題上的堅定做法和突出表現，為日後紅軍各部隊，繼續推廣和完善這一工作，開啟了一個很現實的局面。具體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：（1）在黨內、軍內建立起“黨指揮槍”的集中、統一的領導體制；（2）使中央（軍委）對紅軍各部隊的軍事指揮，在總體上變得更權威、更清晰、更直接、更有效；（3）整合、統一了全黨的軍事力量，把“黨指揮槍”這一理論原則，具體落實到了每一支紅軍部隊，落實到了每一次具體的軍事行動上；（4）使中共和紅軍部隊，真正成為一支新型的、獨立的、有組織、有實力的政治和軍事集團，為日後在抗日戰爭和解放戰爭中，參與“中國命運之大變革”的角逐，並最終取得全國性勝利，奠定了堅實的基礎。

這一歷史性的轉變，我們可以從“西路軍”的組建、征戰、失敗以及善後處理中，找到答案。這裡雖然也有前人成功的經驗，但二萬多“西路軍”將士，卻為此付出了慘痛的代價。他們生命中的閃光和意義就在於：他們是用另外一種方式，續寫了這一重要的歷史性命題，從而在一個階段性的歷史過程中，以他們堅定的信念和頑強的戰鬥意志，完成了一個弱小的政黨，一支弱小的軍隊，由弱變強的轉變。因此，他們的忠勇，他們的奮鬥，他們的奉獻和犧牲，是不應該被歷史和我們後人所忘記的。

2、推動了黨和紅軍新的精英領導集團的形成。回顧我黨和我軍的發展歷史，其精英領導集團的形成過程，有幾個“關鍵點”是不應該被忽視的。就本文論述的範圍而言（限於長征途中），筆者認為：其一是“遵義會議”；其二就是“西路軍”事件。對

於第一點，目前黨內已有共識，在此不加贅述；對於第二點，筆者則認為，目前尚屬於初步認識和探討階段，會有不同看法和分歧。但從客觀歷史的“因果關係”上分析，要確立這個“關鍵點”的學術地位，也是不會有多大問題的。因為上述“因果關係”的建立，不是出自於某些“偶然性”的現象，而是出自於某些“必然性”的規律，這是我們確立學術觀點的基礎。

“西路軍”的軍事失敗，對推動黨和紅軍新的精英領導團隊的形成，其客觀（或被動）的作用，是十分明顯的。原因就在於：面對更為複雜的局面，要求解決問題的主體，要具備更高的政治水平和更豐富的智慧經驗；這必然會催生出一批新的領導人才，聚合成新的精英領導團隊，這是一種歷史的選擇和必然。“西路軍”當時所面臨的問題，應該說在很多方面，都已突破了中共和紅軍所原有的局限性，是在一個全新的領域中展開的。這對參與各方的領導者和決策者而言，都是一次全新的考驗。如何駕馭新的、更為複雜的局面？已成為大家所共同面對的新課題。這裡我們可以借用中共和紅軍，在處理“內部問題”時的做法為例。比如：過去發生在紅軍內部（或黨內）的矛盾和意見紛爭，常常是以本根據地（或本部隊）內部，或本根據地（或本部隊）與中央之間的矛盾為特徵的，具有明顯的“二元化”特點；因此在處理方法上，也相對具有“簡單化”的特點。而“西路軍”的問題則不然，除了涉及到本根據地（或本部隊）與其他根據地（或其他部隊）之間的矛盾紛爭外，還伴有中央（甚至國際）的因素存在；因此在矛盾的特徵上，則更具有“多元化”的特點；這必然導致其處理過程更複雜、更微妙，而處理結果則更帶有全局性和戰略性。從這個意義上講，“西路軍”的軍事失敗，只是問題的一個方面；而另一個方面，對這次危機的駕馭、總結，以及在此基礎

上重新整合政治力量，形成新的精英領導團隊，因勢利導，努力把“壞事變成好事”，則需要採取更為積極的態度，和更為有效的處理方法。應該說，新的精英領導集團，在這些方面都有非常成功的表現。他們在化解這一危機過程中，進一步確立了團隊在全黨的領導地位；最終順應了歷史的選擇，成為中國革命新的旗手。

3、對於“西路軍”軍事失敗的總結和宣傳，最終演變成我黨、我軍一次成功的、最為政治化的全面勝利。這一勝利，推動了全黨、全軍在政治上、思想上和組織上的統一，其歷史作用是不容忽視的。但是我們也應該看到，在很長一段時間裡，對“西路軍”問題的看法，主要是通過“政治化”的手段，來實現定位的。這種做法，必然會帶來很多局限性：一是壓制了正常的學術研究和理論探討，致使一些重要“結論”偏離史實或根據不足；二是容易把複雜的歷史問題簡單化、孤立化，人為地切斷了歷史事件前後之間的必然聯繫，違背了歷史發展的基本規律；等等。這些局限性，最終會導致對“西路軍”問題的重新反思和理性回歸。

“政治化”的做法，可以在一段時間內，左右人們對歷史的看法，甚至可以影響到歷史的走勢，因此我們說，這也是歷史的一種選擇。我們尊重歷史的選擇，但不等於贊同用“政治化”的方法，來解讀複雜的歷史問題。歷史，還需要進行客觀地研究，來再現它的真實、公平與合理。“西路軍”問題，作為一次慘痛的軍事失敗，如果又因為“政治化”的解讀，而使之喪失基本的客觀與公正，這不能不說是一種歷史的悲哀。因此正確的做法應該是：在承認歷史選擇的前提下，還歷史一個“本來面貌”；把換取這次勝利的代價，放在歷史的天平上，重新“稱一稱”，然

後選擇一個合適的位置，把其奠基在黨史和軍史的豐碑之下。給予歷史以“真實、客觀的反映”；給予先烈和前輩，以應有的尊嚴和榮譽。

### 三、《文獻卷》為我們提供了大量的、原始的歷史信息

這些信息，一方面可以直接幫助我們開展學術研究工作，另一方面還為我們提供了一些重要的研究線索，推動我們對這一問題的認識，不斷深化。對此，筆者也頗有感悟，現提供幾點浮淺看法，供各位參考：

1、關於張國燾在此事件中的地位問題。縱觀《文獻卷》中各方來往的電報，給人明顯的感覺是：張國燾在處理此事過程中，始終沒有處在第一線的位置；而處在第一線位置的，應該是林育英、毛澤東、周恩來和彭德懷等中央領導同志，以及他們所代表的中央（軍委）指揮系統。處在第二線位置的，則應該是“西路軍”前指的兩位主要負責人，即陳昌浩和徐向前。張國燾雖然當時在黨內和軍內的職務較高，但就此事而言，特別是在軍事指揮方面，他的作用，至多可以算做是處在第三線的位置上；甚至從某種意義上講，他的角色基本上可以說是一個“旁觀者”。

2、紅軍三大主力會師以後，中央（軍委）指揮系統，能夠在短時間內迅速統領全軍，有二點基本原因：一是有“國際”的支持；二是有“中央”的權威。這二點“合二為一”，是當時統領紅軍三大主力，重要的先決條件；而這種先決條件的形成，除了有“南下、北上”之爭外，又與當時各方，對討論中央蘇區“五次反圍剿”失敗的態度，有著直接和密切的關係。

3、作為一次帶有戰略意圖的軍事行動，“西路軍”失敗的原

因，不能不從軍事指揮的角度去尋找答案。過去我們在這方面，未曾做過廣泛、深入的討論，而形成較為一致的看法；常常是簡單地套用“政治化”的語言來加以定位，一語而帶過。這不是一種歷史唯物主義的正確態度。“西路軍”的失敗，如果從軍事的角度進行分析，可以肯定地講，在“指揮”和“執行”這兩個層面上，各有各的問題。

（1）指揮層面的問題是：①急於打通國際路線，而忽視主、客觀條件；②戰役計劃變來變去，顧及一點，而不及其餘；③有唯“國際指向而是從”的傾向。這種簡單、生硬的指揮方法，明顯有著“五次反圍剿”用兵之道的影子。

（2）執行層面的問題是：①軍事和政治的關係處理不好，軍事受制於政治，干擾和影響了軍事指揮員的判斷和決心；②戰術運用比較呆板，缺乏機動靈活的指導思想；兵力不夠集中，決心不夠果斷；開始輕敵，後來戀戰，關鍵時刻部隊又徘徊不前，致使戰局始終處於被動應對的局面；③時不佔天，地不佔利，在“人和”方面，內部又缺乏充分溝通和理解，幾乎是集“用兵之大忌”於一身，終日輾轉苦戰，力量消耗殆盡，又得不到補充和增援，最終焉能不敗也？！

“西路軍”是一支英勇的部隊，具有光榮的作戰傳統，其成員絕大多數都是經過長征和戰火考驗的戰鬥骨幹。對於這樣一支驍勇善戰的部隊，在即將完成戰略性轉移之前，卻意外地倒在了祁連山下，折戟於戈壁大漠之中。這不能不令人感到極大的悲痛和惋惜，同時也引發了人們更多的思考和追問。《文獻卷》的出版，為我們科學地回答這一問題，逐步還原歷史真相，提供了堅實的史料基礎。這是一件很有意義的工作，也是對二萬多浴血疆場的“西路軍”將士，最好的緬懷和紀念。

歷史的精彩，不會輕易地從人們身旁走過……。“西路軍”的精彩，不在於它的華麗和完美，而在於它的深刻和曲折。如同一曲戰士的悲歌，如同一段忠勇的挽唱，深深地震撼著人們的心靈，把我們的記憶，永遠地留在他們日漸消逝的足跡上……。共和國的歷史，將會記住這支英勇的部隊，以及他們所走過的悲壯的戰鬥歷程。

### 主要參考書目：

- 1、郝成銘、朱永光等主編：《中國工農紅軍西路軍（文獻卷）》，甘肅人民出版社 2004 年；
- 2、徐向前：《歷史的回顧》，解放軍出版社 1988 年；
- 3、范青：《陳昌浩傳》，中共黨史出版社 1993 年；
- 4、朱佳木：《陳雲和西路軍問題》，蘭州紅西路軍研究會編印；
- 5、朱玉：《李先念對西路軍和正確認識西路軍問題的貢獻》，蘭州紅西路軍研究會編印。